

理想化与存在性的交织：“禅让制”刍议

李友广

(西北大学 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强调“禅而不传”的“禅让制”,在历史上本来就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重大话题。随着20世纪90年代上博简、郭店简陆续面世以来,遂又重新掀起了对这一话题的讨论。在对禅让传说与禅让学说进行疏解的基础上,通过对相关考古成果与研究成果的考察,认为“禅让制”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当为新石器时代初中期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而理想化与存在性的交织则是“禅让制”在历史长河中存在的真实状态。

关键词:“禅而不传”;禅让传说;禅让学说;“禅让制”;禅让时间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5)03-0009-05

关于“禅让制”曾经存在与否在历史上一直是个争论不断的话题。自20世纪90年代上博简、郭店简诸材料面世以来,由于上博简中的《容成氏》以及郭店简中的《唐虞之道》对“禅让制”这个古老的话题皆有所述,故而随之又兴起了与“禅让制”有关的诸多问题的思考与讨论。

在这里,我们首先应当分清作为历史史实的“禅让制”本身与后来作为精神寄托和理想目标的禅让传说及禅让学说之间的区别,也就是说,理想化与存在性的交织当是“禅让制”在历史长河中存在的真实状态。结合当时的社会状况以及相关专家的考证,“禅让制”作为一种曾经存在过的历史史实,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而禅让传说作为对历史史实的一种口头相传与重复记忆,当在禅让史实一经过去不久便开始出现了;禅让学说作为以学理形式出现的、经过了诸家理性思考后的产物,出现的时间比禅让传说要晚得多。对此,丁四新把禅让学说的起源定在了春秋战国诸子的时代,并根据郭店简《唐虞之道》所显现的禅让学说理论系统的成熟性,将

其起源进一步限定为春秋后期或战国前期,亦认为“禅让传说的起源比禅让学说的起源早得多,大约尧舜禹禅让的历史事实一旦成为过去,而逐渐成为人们口口相传的故事的时候,传说就有了自己起源的历史特征”^[1]。禅让传说与禅让学说在历史上均存在过,其真实性不言自明。于此,唯一需要辨明的是,“禅让制”在尧舜禹时代是否存在过,如果存在过,那么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还是因为成了政治工具与政权合法性的幌子而徒有其表呢?这些都是需要详加考辨,并加以澄清的,惟其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进行下一步的思考与研究。

一、禅让存在时间之考索

从传世文献所记载来看,尧舜禹所处的时代,当是一个社会秩序基本确立、英雄惠民的时代,尧、舜、禹莫不是贤能无私、异于常人之人。然而书不可不信亦不可全信,我们还应当分析文献产生的时代背景及作者的写作立场,尽可能地去接近历史的真相。

收稿日期:2015-04-08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C009)

作者简介:李友广(1978-),男,山东营县人,副教授,哲学博士。

与“禅让制”有关的传世文献,《尚书》属于较早之材料。然而,《尚书》绝大部分篇章出自后人之手,最早的也是在春秋时期,更不用说有些是在战国写就了。这距离尧舜禹所处的时代少说也有1 300多年的时间,即便是《尚书》的著者(当然不可能是一人一时完成的)尽可能地保持理性的写作立场,却也难以完全摆脱口口相传的禅让传说自身所挟带理想化色彩的影响。更何况,著者所处的时代(包括春秋、战国及秦汉)多是失序无章的流离乱世^①,在这样的历史境遇下,当著者以宣扬秩序井然、“禅而不传”^[2]的禅让传说为思想资源进行思考、构筑禅让学说时,在巨大的反差面前,其写作立场很难说是完全理性而无偏谬的。

正如前文所及,作为一种历史史实的“禅让制”,是真正存在过的(此并非似尧舜禹时期的“禅让制”那样的多具形式意义)。同样,郑杰文也认为“禅让作为一种历史事件,在上古父系氏族社会中确实存在过”^[3]。在此,我们首先来推断一下其大概所处的历史时期。从考古学现有的成果来看,有人类存在的原始社会可分为旧石器与新石器两个时代,而生活在旧石器时代的是直立人与智人,然而,无论是直立人还是智人,其体质形态上仍留有较为原始的特征,脑容量也不及现代人,而历史上真正存在过的“禅让制”,作为一种较为成型、成熟的部落联盟首领继承制度,以直立人与智人的思维能力与理性认知度是难以胜任的。

不同的是,生活在新石器时代的则是现代人,他们在形体与生理构造上与今人已没有太大的差别。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11 000~7 500年),农业还是以“刀耕火种”的方式为主,到了中期(距今7 500~5 000年)以后,农业经济才发展到了翻土耕种、熟荒耕作的锄耕农业,长江流域甚至出现了农业灌溉。这个时候,中国社会已基本进入了农业生产的经济形态,考古学家们曾从各地出土文物的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储备完好的五谷实物,其中在河北磁山遗址发现了成堆的腐朽粮食(经鉴定为粟类遗存,距今8 000年),河姆渡文化遗址则出土了大量的水稻(距今7 000~6 000年)^[4-5]。从对自然的认知度与对新的耕种工具、灌溉技术的掌握程度来看,此时出现“禅让制”当是有可能的。

此外,从战国前后所流传的禅让传说来看,其主角皆为男性,而女性在这当中则难见踪影,虽然传说未必完全符合历史真相,但亦应保有对过去事件的残留,所以,“禅让”的真正发生应该是人类开始进

入或者已经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的事情。如果以此为据,那么其存在的时间就应是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初、中期。这一时期,以仰韶文化为例,考古学家们在甘肃省甘谷灰地儿^[6]、陕西省铜川市李家沟遗址^[7]中都发现了代表男性生殖器的陶制品——陶祖,黄陵还发现过男人的陶塑头像^②,这都说明在新石器初、中期,男子的社会地位开始上升,并开始占据社会的主导地位,母系制开始向父系制过渡。所以,这些考古材料可以初步佐证,“禅让制”的真正存在时间属于新石器时代初中期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

从时间界限上看,由于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初中期(距今11 000~5 000年)生产力落后,社会财富并没有多少剩余,私有的观念尚处萌芽状态,阶层的分化也不显著,这时真正存在“禅让制”是非常有可能的。对此,徐中舒亦说:“自私有制和传子局面产生以前,禅让或推选是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我们可以在少数民族史中得到例证”^[8]。但是,当社会进化到原始社会末期即传说中的英雄时代(指炎黄、尧舜禹所处的时代)后,原始社会已行将就木,国家也处于形成的前夜,这时对权力的争夺当是十分惨烈的,而绝不会如传说中的那样温文尔雅。因而,尧舜禹时期的禅让更多的则是儒家心目中理想的权力转移方式。

二、禅让传说与权力争斗

关于炎、黄二帝所处时代的情景,《史记·五帝本纪》载曰:“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于是,“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是黄帝征伐的蚩尤原因,但蚩尤“不享”、“不用帝命”恐怕是黄帝更难容忍的格局,维护王者的权威与地位也是不应忽视的重要原因。“诸侯相侵伐”现象的背后则是对神农顶级权力的垂涎与角逐,而轩辕无疑用武力恢复并保持了稳定的社会秩序,于是,在斗争过程中权力逐渐转移到了黄帝手

① 这一时期涉及“禅让制”的传世文献,除了《尚书》外,还有《论语》、《墨子》、《国语》、《左传》、《孟子》、《荀子》、《庄子》、《战国策》、《韩非子》、《楚辞》、《吕氏春秋》、《史记》等。

② 见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藏品。

里。所以说,不管神农与黄帝之间的权力最终是以何种方式成功实现转移,但可以肯定的是,黄帝能成功地问鼎权力顶峰是与自己在武力斗争过程中实力与威望的大幅提升有着莫大的关系。

另外,有关帝尧的身世,《史记·五帝本纪》云:“帝啻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皞氏女,生摯。帝啻崩,而摯代立。帝摯立,不善,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也就是说,摯与放勋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很显然,于此是弟代兄立,在舜帝之前曾存在过亲亲相传的血族世袭制,并非如同后世所说的那样尽为贤贤相传的“禅让制”。

当然,无论是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材料,对于上古禅让史上的人物,多加称道的似乎还是尧和舜,郭店简《唐虞之道》第1号简即是称道尧舜的:“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2]。不过,仔细考量郭店简《唐虞之道》,我们就会发现其内容并非全部都是称道尧舜之禅让的。如第25至27简云:“古者圣人,廿而冠,卅而有家,五十而治天下,七十而致政。四肢倦惰,耳目聪明衰,禅天下而授贤,退而养其生。此以知其弗利也。”“致”,给与,“致政”,即交还政事,意即辞位让贤。也就是说,远古的圣人到了七十岁(此处并非一定实指)的时候就会辞掉帝位而颐养天年,但此处并未言明是主动让贤还是被迫退位的。我们再看,简文说“四肢倦惰,耳目聪明衰,禅天下而授贤”,这明明是说此时的圣人已是年迈体衰,力不从心了,而“耳目聪明衰”也喻示着其办事能力的骤降。艾兰和魏克彬也说:“《唐虞之道》的内容是尧、舜禅让传说的一个版本。这里,我们发现尧决定禅让给舜的原因,是因为他既老且弱。”^[9]在这种情况下,其对天下局面的控制力也一定大不如前了,那么只有放弃手中曾经紧握的权力了,言外之意,圣人禅位于贤似乎还有别的原因,并不一定完全是因为内在德性之牵发而自觉、自愿地禅让的。对于这种学理上的推断,有学者就试图从考古成果来寻找证据,他们根据对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考古材料的分析认为,“唐尧与其继任者之间的政权更替是通过革命式的暴力手段完成的,因而尧舜之间的禅让是不存在的”^[10]。所以,主要以郭店简《唐虞之道》作为尧舜禅让是历史事实的材料证明并不见得有多么可靠。

三、三帝禅让之真相

为了更好地接近历史真相,我们有必要详加考

辨尧舜禹所处时代的背景。据张光直、童恩正、谢维扬等学者的研究,尧舜禹所处的时期相当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时期(约公元前2500年),这一时期,农业、养畜业、手工业都得到了发展,社会的剩余产品和财富也得以增加,于是在原始公有制逐步瓦解的过程中,已经萌芽的私有制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反映在墓葬上,便是墓葬的规模及随葬品的多寡有了很大的差别,这说明了贫富的差距在扩大,此进一步导致了等级或阶层分化的加剧^[11]。经由研究者的考证,这一时期正是尧舜禹“禅让”盛行的时候,很显然,这与当时所处的社会背景是有所抵牾的。可见,尧舜禹所处的时代远不如后世描述的那样美好,这期间也会存在着战争、政治权力的角逐等诸如后世所面临的同样的社会现象。而“禅让制”的真正实现,又不仅需要在位者对于天命神意充满敬畏,同时更要有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与极度贫乏的物质财富等客观存在的社会条件与之相匹配,这是其能够得以真正实现的核心质素。然而,从当时的情形来看,这是难以实现的,社会剩余产品和财富的增加,使得贫富分化在加剧,私有制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因而等级或阶层的界限更为明晰,当时的人们不可能不萌发私欲,以为本人或本集团谋取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禅让”往往成为打压敌手、角逐权力宝座的口号与工具^[12]。

不过,在“禅让制”正行其时的时候,中断了的传子制度似乎又在重新崛起。传世文献中曾多次提到“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避’的意思,就是传子的可能性已经存在,为避免在传位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冲突,继位者主动避帝之子,等待获得承认的时机。可见当时,传子已成为一种可能的选择了。”^[13]其实,传子制不仅是一种可能的选择,而在帝尧之前就已实行过了,虽然领袖人物数代出自同一个家族并不等于世袭制已经完全确立,但在这其中肯定出现过传子的情况,而且不止一次,也就是说世袭制在此的确出现过。即便是在帝尧身上,我们还是能看到传子制的影子,比如《史记·五帝本纪》云:“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从这一“终”字,我们就可以看出尧下定“卒授舜以天下”这一决定的勉强和在舜与丹朱之间的多次权衡,这与尧否定丹朱参与治水的果断判若两人。而且,这一“利”字,也说明了联盟首领是利可图的。因此,尽管舜在尧老时已取得了很多业绩,但在尧“三年之丧毕”后,舜还要“让避丹朱于河南之南”,这就说明丹朱在当时也有着很强的实力^[14]。

四、结语

由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对于“禅让制”这一问题自春秋晚期就已存在着分歧与争议了。不过,不得不说的是,自此亦开始有了尚古、托古之风(孔子就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分见《论语·八佾》、《论语·述而》),战国更盛。盖因此,所以后人往往多据此认定“禅让制”为传说或理想诉求。当然,即便是尚古、托古之风盛行,在当时仍有思想家对其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以试图揭开“禅让制”的真面目。

根据对考古界和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的考察,我们认为史上诸家之所以对“禅让制”众说纷纭,其最大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中的多数人将上古时期的“禅让制”看作了一个孤零零的历史事件,或者说视为仅仅发生于尧舜禹时期的帝位传承事件,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历史的视域与辩证性思维。从历史情境与考古材料来看,“禅让制”事件在上古时期是存在过的,只不过其真正存在的时间当上推至英雄时代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初中期(距今11 000~5 000年),而到了炎黄、尧舜禹争锋的英雄时代,“禅让制”由于失掉了其存在的旧有社会土壤与客观条件,便逐渐脱掉了本有的内在质素而沦为了权力争斗的借口与工具,但是由于“禅让制”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影响力,致使这一时期的帝王在权力争斗的过程中也不得不有所顾忌,并往往以“禅让”的名义来权衡、选择接班人,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与集团利益。故而,曾经存在过的“禅让制”便成为了后世“禅让”传说与“禅让”学说的根本精神资源,而英雄时代的已经脱掉了内在质素、空留躯壳的“禅让制”则让后人那向往的目光变得更加迷惑了,这当是后人对于“禅让制”众说纷纭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参考文献:

- [1] 丁四新. 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0.
- [2] 刘钊. 郭店楚简校释[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3.
- [3] 郑杰文. 禅让学说的历史演化及其原因[J]. 中国文化研究, 2002(1): 26-40.
- [4]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 邯郸市文物保管所. 河北武安磁山遗址[J]. 考古学报, 1981(3): 303-346.
- [5]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浙江省博物馆. 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 1978(1): 39-94.

即便是以孝贤著称的帝舜,也并未赢得后人的一致称赞。文献材料包括《韩非子·说疑》、《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广宏明集》^[11]引《汲冢竹书》、《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等对于舜囚禁尧,逼迫尧将帝位传给自己的行为皆有记载。舜对尧子丹朱也是多加安抚,后来把他封为诸侯,《太平御览》卷63引《尚书逸篇》:“尧子不肖,舜使居丹渊为诸侯,故号丹朱。”很显然,舜的如此做法,既是对尧之子丹朱的一种安抚,还有可能是他在夺尧之位后的一种炫耀。

我们再看上博简《容成氏》中的内容,上博简《容成氏》(此篇简序依据陈剑的论文)第十简:“尧有子九人,不以其子为后,见舜之贤也,而欲以为后。舜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不得已,然后敢受之。”第十四简:“舜有子七人,不以其子为后,见禹之贤也,而欲以为后。禹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不得已,然后敢受之。”第十七简:“禹有子五人,不以其子为后,见皋陶之贤也,而欲以为后。皋陶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遂称疾不出而死。禹於是乎让益,启於是乎攻益自取。”^[15]此三简内容虽异,然句式结构相同,不能不让人生疑。是时,执政之帝皆有子数人,其中亦当有贤明之人,不可能皆为顽愚,然不以其子为后,而独见他人贤,为何?若非其人势大位重,实在找不出更令人信服之理由。另外,为何被选中者皆“五让以天下之贤者”呢?此既说明“天下之贤者”不独被选中之人,亦说明了“五让”使从尧到舜这种“禅让”的权力交替原则完全被程序化了^[16],从而有可能成为了一种习俗礼制与传统。欲真让于他人,拒辞不就即可(如同皋陶称疾不出),何必“五让”?而且,上博简《容成氏》乃战国时期的作品,更何况此时尚古、托古之风甚浓,所以尧舜禹时期的“禅让”一说未必真实,然而此当亦彰显了战国时期人们对于礼让贤明、谦让不争之风的向往与追求。

关于禹,其在帝位继承方面的做法更是倍受后人非议。从传世文献里可以看出,禹先是选择颇有威望但年龄与己相仿的偃姓部落首领皋陶为继承人,但他却先禹而死。于是,禹又荐举没有多少影响力的益为继承人。对于此事,《战国策·燕策》评论说“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这表明“禹的举措在实际上为启开辟了道路,而且也能感觉到当时的禹已经有了相当强烈的权势欲,并且在许多事情上善于玩弄权术。”^[17]可见,与帝舜相比,禹“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做法更令后人诟病。

- [6] 张学正,张明川,郭德勇. 谈马家窑、半山、马厂类型的分期和相互关系[C]//中国考古学会. 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69-70.
- [7] 西安半坡博物馆. 铜川李家沟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J]. 考古与文物,1984(1):5-34.
- [8] 徐中舒. 先秦史论稿[M]. 成都:巴蜀书社,1992.
- [9] 艾兰,魏克彬. 郭店《老子》:东西方学者的对话[M]. 邢文编,译.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
- [10] 王晓毅,丁金龙. 从陶寺遗址的考古新发现看尧舜禅让[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87-91.
- [11] 高炜. 龙山时代的礼制[C]//《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年论文集》编辑组. 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 [12] 李民,张国硕. 夏商周三族源流探索[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
- [13] 刘蔚华. 中国儒学的起源[C]//张秋升,王洪军. 中国儒学史研究. 济南:齐鲁书社,2004:6.
- [14] 李学勤. 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 [15] 陈剑. 上博简《容成氏》的竹简拼合与编连问题小议[C]//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 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 [16] 丁四新. 楚简《容成氏》“禅让”观念论析[C]//刘大钧. 简帛考论.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204.
- [17] 晁福林. 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Interweave of idealization and existence: discussion on “the abdication system”

LI You-guang

(Institute of Chinese Ideology and Cultur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Shaanxi, China)

Abstract: As a controversial important topic in the history, “the abdication system” which emphasizes “demise instead of hereditary system” arouses heated discussion again due to the discovery of the bamboo slips in Shanghai Museum and the bamboo slips unearthed at Guodian. On the basis of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abdication legend and the abdication speculation,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he relevant archaeological achievements and research findings,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abdication system” is more likely to exist during the early and middle Neolithic Age, while the interweave of the idealization and the existence is the existing state of “the abdication system” in the history.

Key words: “demise instead of hereditary system”; abdication legend; abdication speculation; “the abdication system”; the time of abdication